

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

一种非国家行为体的视角

李金祥·著

关于国际体系变迁动力的理论研究
作为“行动者”的“非国家行为体”
体系变迁：“行动者和结构”的范式
UN经社理事会制度结构的变迁动力
中日东海问题上文化结构的变迁动力

海外借

时事出版社

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

一种非国家行为体的视角

李金祥·著

关于国际体系变迁动力的理论研究
作为“行动者”的“非国家行为体”
体系变迁：“行动者和结构”的范式
UN经社理事会制度结构的变迁动力
中日东海问题上文化结构的变迁动力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一种非国家行为体的视角/李金祥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195-0082-5

I. ①国… II. ①李… III. ①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IV. ①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2714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市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5 字数：240 千字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青年学者李金祥的著作《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一种非国家行为体的视角》是一部研究当代国际体系变化的理论著作。数年前，李金祥曾经以这一课题在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和撰写其博士论文。目前成书的内容既包含他当时博士论文的基本内容，也包含他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博士后时期的思考与补充。所以，此书真可谓是以“十年寒窗”的刻苦攻读换来的成果。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领域中，国际体系的变迁因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均有不少关于其的著作问世，通过本书导言中所做的学术评价，读者就可管中窥豹，了解其精深的内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是民族国家是主要行为体的假定，学者们或是讨论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相互作用，或是分析国际体系对于国家的制约关系。现实主义学者关注体系的整体性变更和体系内的渐变。新自由主义学派强调制度变迁对体系变迁的结构性作用，也分析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进程对结构的影响。很少有人去研究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政治结构的建构作用。

李金祥没有在前人诸多的成果前停止探索的脚步，他深入研究和借鉴近年来建构主义理论发展而催生的新成果，考察了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国际体系变迁中正在形成的新动力，诠释这种动力生成的原因，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对结构变迁的不同作用。此书的理论目的是深入探讨行为体与结构互动，尤其是对后者的影响，并说明非国家行为体

同国家行为体一样，也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能。作者逐层讨论了结构对行为体的文化及物质约束，分析了非国家行为体作为行动者如何发挥能动作用，这些看法比较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在相关领域中的理论探索和创新。

此书不仅以抽象的理论分析为读者打开了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本质和意义的认知大门，而且力图通过案例的分析来深入揭示非国家行为体在实际国际关系中的运行轨迹。作者独辟蹊径，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和海内外“保钓运动”为载体，详细分析了前者通过吸纳国际社会中大批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谈判，从而在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显著强化了联合国行动的可行性、合法性和正当性。

在后者中，作者通过对“保钓”团体数十年不间断的活动的归纳，展示了其对公众舆论的动员及对政策的影响，包括对中日两国在“共同开发”方面形成共识产生的建设性影响。这些分析以理论为指导讨论了非国家行为体对体系变迁的渐进性推进，同时也以实际事例验证了理论的可靠性和边界。

当前，中国开始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书的理论研究也为读者深入理解参与全球治理的意义，以及中国如何在全球治理中以较低成本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提供理论参考。全球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各国社会内部多层次的参与，尤其是通过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近年来，中国不仅加大了在“联合国”和20国集团等国际组织的参与力度，还发起建立了“亚投行”、“金砖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等新的非国家行为体。这些行为体在推进各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互利共赢，影响未来国际规则的塑造方面正发挥重要影响。但是，在当前全球化加速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主导的非国家行为体在数量和能量上都远不能与发达国家主导下的非国家行为体相比较，只有更全面地掌握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变迁中的能动作用，同时了解体系作为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未来的中国才能在全球治理的领域中取得不断进展。笔者认为，这就是此部著作在经验领域中也可以为读者打开思路，让大家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国际

关系已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多种行为体复杂互动关系的意义之所在。

李健

2017年1月16日于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CONTENTS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节 关于国际体系和变迁内涵的理论解释 /1

第二节 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8

第三节 分析框架 /14

第一章 关于国际政治体系变迁动力的理论研究 /20

第一节 国际政治体系变迁的理论解释 /20

第二节 理论解释存在的问题 /25

小 结 /31

第二章 作为行动者的非国家行为体 /33

第一节 非国家行为体的性质分析 /33

第二节 世界政治行为体视角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定义 /38

第三节 非国家行为体的分类 /42

一、跨国组织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分类之匙 /44

二、非国家行为体的分类 /47

第四节 作为行动者的非国家行为体 /50

小 结 /54

第三章 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行动者和结构”问题 /56

第一节 经典现实主义:行动者为中心的研究纲领 /56

第二节 沃尔兹偏重结构的新现实主义 /60

第三节 新自由制度主义:改造的结构研究纲领 /68

小 结 /72

第四章 结构能动范式中的“行动者和结构”问题 /78

第一节 有关“行动者和结构”理论争论 /79

第二节 建构主义理论中的生成性结构概念 /86

第三节 建立一种生成性行动者理论和结构变迁模型 /98

小 结 /115

第五章 经社理事会推动制度结构的变迁

——以联合国有关非政府组织咨商地位的制度为例 /118

第一节 冷战结束前经社理事会对 NGO 的制度安排 /122

一、申请的资格条件 /124

二、申请的类别 /124

三、获得咨商地位后,非政府组织应当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125

四、咨商地位的中止或取消 /126

第二节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面临的问题情境 /128

第三节 经社理事会对国际政治结构变迁的能动作用 /139

小 结 /146

第六章 中日东海问题上友好合作理念的形成

——跨国保钓运动推动下的观念结构变迁 /151

第一节 20 世纪 70 年代初跨国保钓与中日竞争性的观念结构 /153

一、保钓运动影响政策的权力推动美国的理念变迁 /160

二、保钓运动影响决策的权力推动日本理念的变迁 /162

三、保钓运动的话语权力推动中国政府理念变迁 /164

第二节 竞争性扩展到东海问题和 20 世纪 90 年代保钓 /170

第三节 21 世纪初跨国保钓和中日东海问题上形成“共同开发
理念” /180

小 结 /193

结 论 非国家行动者推动着国际体系变迁 /197

参考文献 /209

后 记 /226

在日常生活和学术专著中，人们经常会碰到国际体系这一术语，它是人们日常观察和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切入点。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认为，没有国际体系的概念，人们就很难证明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是有道理的。^①而且，在构建理论体系时，国际关系研究者也必须直面体系变迁的问题。只有对体系变迁的现象和实质进行理论分析，研究者才能有力地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的一些后果。

第一节 关于国际体系和变迁内涵的理论解释

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其创立之初，研究者就开始探讨国际体系的变迁问题。1990年冷战的结束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催生了学界对国际体系变迁研究的热情，并产生了大量成果。不过，迄今对于国际体系和变迁内涵的理论研究，学者们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从现有研究来看，体系变迁理论自身包含丰富的内容，如变迁的形式、基准（benchmark）、原因、方向、动力等等。

在国际关系学科建立之初，西方学者就开始尝试界定国际体系的内

^①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The Idea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y Meets Histor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5, No. 3, 1994, p. 232.

涵。斯坦利·霍夫曼指出，“国际体系是世界政治基本单元之间的关系模式，其特点表现为这些单元所追求目标和它们之间任务执行的范围，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和执行这些任务所采用的手段。决定这一模式的乃是世界的结构、主要单元之间或其内部的力量性质，它们的能力、权力模式和政治文化”。^① 由于该定义强调基本单元，而国际关系史上最基本的单元就是国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即使在那些奠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基础的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国际体系一般也被定义为国家间体系（interstate system），而且人们“如今已根深蒂固地将这两个概念等同看待”。^②

以国家为中心，研究国际体系及其变迁是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主流理论的出发点。

这类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人，经典现实主义者 E. H. 卡尔和汉斯·摩根索都探讨过体系变迁的问题。在名著《二十年危机》中，卡尔认为，国家不会是亘古不变的，随着国家的消失，其他有组织的团体权力形式会取而代之，那必然会是一场革命，现阶段国际政治中存在的种种事物将俨然无法适用于新的形势，国际关系也会被一套新的团体间关系所取代。将来，主权很可能成为比现在更加模糊、更具歧义的概念。^③ 换句话说，主权国家发生变化时，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也必然随之变迁。与卡尔类似，汉斯·摩根索也认为，国家必然会被更大的行为单位所代替。^④ 经典现实主义探讨了变迁的原因和基准，即构成体系的行为体自身属性的变化。

20 世纪 70 年代，新现实主义学派兴起。新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在国际体系中引进了“结构”概念，国际体系被解释为结构和行为体组成的整体。肯尼斯·沃尔兹把结构看成是由体系内的排序原则 [ordering principles (无政府状态)]、体系中单位的功能差

① Stanley Hoffmann,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Klaus Knorr and Sidney.

②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6.

③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46, pp. 229-230.

④ 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译：《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 页。

异、单位（国家）间的能力分配组成的。由于单位（国家）的功能相似，新现实主义者对无政府状态（结构中的排序原则）的结构会发生变迁又持怀疑态度，认为国际体系不会发生根本变迁。沃尔兹把这两个因素排除在结构的内容之外，单位间的能力分配就成了国际体系结构的主要变量。

在解释体系变迁方面，尽管沃尔兹宣称不关注体系变迁，但他承认，单位层次上的许多变化会引起体系的变迁。^①很明显，沃尔兹支持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即如果体系内的行为体变化了，国际体系就会发生变迁。而且，他的理论也为解释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既然体系由结构和行为体组成，那么沃尔兹的理论就暗含了如下内容——体系变迁也可以是结构的变迁，因而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就指“极”的变化，如两极向多极的转变，这是一种表层结构的变迁。除了国际体系内“极”的变化外，现实主义理论还暗含了另一层的变迁含义，即无政府向等级制的转化。

无论是表层变化，还是无政府排序原则的变迁，现实主义理论毕竟在国际体系变迁与结构之间建立了联系。换句话说，国际体系变迁的基准也可能是结构，这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一大进步。

由于结构现实主义者重点关注主要大国的能力分配，在这里，国际体系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国际格局的意思。

另一位关注体系变迁的现实主义者是罗伯特·吉尔平。他把国际体系的变迁解释为三种类型。第一，体系变更，也就是国际体系本身的特征所发生的主要变化。这里的体系特征主要是由构成该体系的各种实体或主要行为者，如帝国、民族国家或者多国公司等性质决定的。^②第二，系统性变革，这涉及国际体系统治的变化，包括权力在国际上分配的变化、威望等级的变化及体系中具体规则和权力的变化。这是一种系统中主导单位的变迁，比如“统治某个特定国际体系的那些居支配地位的国家或帝国

① 肯尼思·沃尔兹：“反思《国际政治理论》——对我的批评者们的答复”，罗伯特·O. 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298页。

② 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的兴衰”。^①这实际上就是权力分配结构的变迁。第三，互动的变化。这是指一种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者之间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互动，或者是各种进程的变化，通常体现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利和规则的变化。^②尽管划分了三种类型的体系变革，但是吉尔平也承认要完全区别它们并不容易。例如“体系的变更同时也涉及系统性变革和互动的变化，而国家间互动的变化可能是系统性变革甚至最终发生体系变更的前兆”。^③从本质上来看，吉尔平关于体系变迁的基准仍是体系的单元。正如秦亚青先生所指出的，吉尔平对于体系自身变迁做出了根本的界定，这就是体系单位性质的变化。“单位质变”是体系变迁的基本判断标准。^④

虽然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探讨过或者涉及到体系变迁的原因和标准，但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结束，理论界普遍认为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都未能解释冷战的终结和体系变迁。^⑤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理论界出现了诸多有关国际体系变迁的解释，其中许多学者更为关注体系变迁的方向。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在其1989年论文的基础上提出“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国际关系变迁的原因来自于国家内部结构的变化。由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可以满足各国民众“获得认可的欲望”，自由民主制度会在国际体系里扩散。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一个民主和平的国际体系来临了。从这方面来看，国际体系变迁的原因来自于国家自身的统治形态的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

① 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页。

② 同上书，第43页。

③ 同上书，第41页。

④ 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3页。

⑤ Stein, Janice G., “Political Learning by Doing: Gorbachev as Uncommitted Thinker and Motivated Lear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4, Vol. 48 (2), pp. 155 - 183; Risse-Kappen, Thomas, “Ideas do not Float Freely: Transnational Coalition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4. 48 (2), pp. 185 - 214; Koslowski, Rey. and Kratochwil, Friedrich V. “Understanding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oviet Empire's Demi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4, Vol. 48, pp. 215 - 247; Lebow, Richard N. “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ailure of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4, Vol. 48, pp. 249 - 277.

与经典现实主义思考国际体系变迁的视角相同。而美国著名学者乔治·莫德爾斯基 (George Modelski) 和威廉·汤普森 (William Thompson) 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福山的观点, 他们认为, 国际体系变迁的方向是和平繁荣的国际体系。莫德爾斯基和汤普森一改研究世界政治经济大循环的世界长周期论的视角, 也摒弃了他们以往的看法——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会随着经济力量的转移而变迁, 提出了民主和平演进论。此理论认为, 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经胜出, 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在国际体系内的扩散是国际体系变迁的原因。^① 这仍是以行为体本身的变化为原因来思考国际体系变迁。

与从行为体自身的变化为基准来解释变迁不同, 一些新现实主义者、以基欧汉为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以温特为首的建构主义主张从结构的功能作用来解释变迁, 并且认为变迁的基准就是权力分配、制度或者不同的无政府文化。

正如上文所说, 新现实主义者的结构指国家间的权力分配。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戴维·威尔金森 (David Wilkinson) 提出了单极稳定论。他认为, 国际体系变迁的方向是一个强国 (美国) 主导的稳定世界。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超过任何一个国家, 而这个主导国不是霸权国, 体系内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能力来发动一场霸权战争以代替美国的单极地位。^② 而沃尔兹 1993 年发表的文章不同意这种单极稳定论。在重申行为体变化与结构变迁之间关系的同时, 沃尔兹认为核武器等因素在国际体系内的分配将会决定国际体系向多极化的方向变迁。^③ 虽然这两位现实主义者对结构的发展看法不同, 但他们也有相同点, 即都

① Modelski, George, and William Thompson, *Leading Sectors and World Powers: The Coevolution of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6.

② Wilkinsons, Avid, "Civilizations, Cores, World Economies, and Oikumenes." In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edited by 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K. Gill. London: Routledge, 1993.

③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Autumn, 1993), pp. 44-79;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p. 5-41.

从结构视角来思考体系变迁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以类似的视角来思考体系变迁。在“文明冲突论”里，西方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八种文明在国际范围内的分配是体系变迁的原因。

以罗伯特·基欧汉为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在考虑体系变迁时，新现实主义局限于权力的分配，而忽视了制度因素。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把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纳入到结构中，结构被看成是一种制度的分配。国际制度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① 基欧汉等人从制度结构的功能视角提出了四种解释国际制度变迁的模型：经济进程解释模型，即以经济和技术变革为体系变迁的原因；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型，即使用总体权力结构来解释变迁（强国主导新制度和规则）；问题结构解释模型，即用问题领域里的权力结构来解释制度变迁（由该问题领域中的强国制定制度规则）；国际组织解释模型，即政府间组织和跨政府间的网络、规范和制度推动国际制度和规范的变迁。^② 可见，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也认为体系变迁来自结构层次的原因。这派理论在国际制度和体系变迁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体系变迁就必然要考虑到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的变迁，变迁的标准也可能是制度的变迁，这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对体系变迁问题的研究。

世界体系论者也从结构的功能视角来解释国际体系的变迁，其侧重于用制度来表述结构。沃勒斯坦等人认为：“1945—1990年间的岁月只是现代世界体系长期历史演进中最近的一个历史时期”，而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它从形成的那一刻起就包含了一整套序列的制度结构，规范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活动。沃勒斯坦称这些制度变量为世界体系的向量，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构成部分，又是影响体系演变的重要因素。它们伴随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不断地被重构，相互间“可以区分但无

①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 3-4.

② 罗伯特·O. 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和相互依赖》（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0页。

法分离”，“任何一个或它们彼此间发生振荡、障碍或转化的情况，都将影响其他变量”，甚至诱使整个体系发生“危机”。依据这一认识，沃勒斯坦等人的分析从各个向量的演化切入，进入到构造体系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层面。^①在沃勒斯坦看来，变迁的方向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现存的世界体系继续发挥作用。美国的霸权地位虽然遭到削弱，但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军事实力上仍然保持一定的领先地位，它将不遗余力地在北方诸国寻求新的联盟，以图继续左右世界体系的发展。欲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必须克服体系的主要制度变量目前所遭遇的困难。对此，可说是前景莫测。另一种可能性是，发生体系危机或分叉，出现一个混乱时期，其结果亦将是不确定的：或重构一种与以前体系一样的充满等级、不平等和压迫的体系，或可能构建一种相对平等和民主、较为和谐的新体系。由此来看，这派理论不仅对20世纪下半叶体系的变迁方向做出具体描述，而且触及到诱发体系变迁的某些原因，即经济领域的制度变化是国际体系变迁的原因。

20世纪末期，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在国际政治理论界兴起。这一学派认为，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是文化的分配。温特列出了三种无政府的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国际体系的变迁方向是康德文化。体系变迁的原因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国家的自我约束。除了国家的自我约束是从行为体的视角来看变迁以外，其他三个因素都是从结构的视角给出了原因，因而建构主义的变迁理论也带有浓烈的功能主义色彩。不过，建构主义理论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国际体系变迁也是国际体系内文化分配的变化。

此外，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国际体系的变迁。冷战结束后，有关体系变迁的各种观点纷纷出现，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罗斯诺（J. Rosenau）教授认为“后国际政治”和划时代的变迁降临了，“全

^① 特伦斯·霍普金斯、伊曼纽尔·沃伦斯坦等著，吴英译：《转型时代》，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吴英：“沃伦斯坦怎样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转型——评《转型时代》”，《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第103页。

球治理”的新体系出现了。^① 有学者认为当时处于发生根本变迁的新纪元,^② 美国奥伯尼市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柯斯洛斯基 (Rey Koslowski) 和德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克拉托契维尔 (Friedrich Kratochwil) 宣称冷战的结束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变迁——不是体系内的变迁而是整个体系的变迁;^③ 1998 年国际关系协会年会的主题之一是“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国际秩序。

综上可见, 国际体系变迁研究主要包括两类理论, 一类是研究体系中的单元转型, 另一类是研究体系中的结构。从以上学者的相关解释来看, 一方面, 国际体系的确在发生变迁; 另一方面, 学者们在研究变迁时, 对变迁的基准和原因的分析比较深入。变迁的标准可以是体系内的行为体 (即国家行为体自身的统治形态或者职能), 也可以是体系内的结构。不过, 用约翰·鲁杰的话来说, 在国际关系这个学科, 对变迁的研究就是对结构的研究。^④ 本书关于国际体系变迁的基准, 兼顾国际体系内的单元和结构的变迁。

第二节 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单极稳定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民主和平演进

① James N.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 1;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

② Yoshikazu Sakamoto, “A Perspective on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A Conceptual Prelude”, In Yoshikazu Sakamoto (ed.) . *Global Transformation: Challenges to the State System*.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5 - 16.

③ Koslowski, Rey,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Understanding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oviet Empire’s Demi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4, Vol. 48: 2, pp. 215 - 248.

④ 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 Space, Time, and Method”, in Ernst-Otto Czempiel and James N. Rosenau. , *Global Changes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 Approaches to World Politics for the 1990*, (Lexington, MA, and Toronto: Lexington Book, 1989), p. 21.